

民国外交家丛书

石源华 主编

『三世』外交家伍廷芳

张礼恒 著



他一生历『三世』，纵横国际外交舞台，终成著名外交家。

他是中国近代外交的亲历者。

他是中国法律改革的主持者。

他两次担任驻美公使，抗议美国排华法案，批判西方文化至上论。

他主持南北和谈，促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

他曾任民国代理国务总理、外交部长。

他鼎力辅佐孙中山，长逝于军阀叛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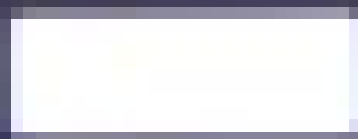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三才圖會

卷之六

三才圖會

卷之六



民国外交家丛书

石源华 主编

『三世』外交家伍廷芳

张礼恒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世”外交家伍廷芳/张礼恒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 3
(民国外交家丛书/石源华主编)
ISBN 978-7-5334-6700-5

I. ①三… II. ①张… III. ①伍廷芳 (1842~1922)
—传记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7514 号

民国外交家丛书
石源华 主编

Sanshi Waijiaojia Wu Tingfang

“三世”外交家伍廷芳

张礼恒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86907 83726290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邮编: 350014)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272 千

插页 2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6700-5

定价 43.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总 序

石源华

一

外交家，顾名思义是指代表国家对外进行交涉，为本国国家利益活动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地位、国际声誉和历史贡献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时代机遇、本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也与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学识修养、国际联系及外交能力相联系。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增多，对外交往随之大增。晚清外交体制和外交官员队伍在中外冲突与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发生变化。19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之时，清朝政府尚没有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对外事务由负责朝贡事务的礼部和管理边远地区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理藩院兼管。遇有重大交涉事件或紧急情况，由皇帝直接派遣钦差大臣负责办理。外交官员一般由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兼任。

1861年，清政府批准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因8月发生热河政变，该衙门的实际地位随之增高，职能范围有所扩大，不但成为中外交涉的中枢机构，而且成为洋务运动的主持机构，被称为“洋务内阁”。该机构的设立与强化，客观上反映了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晚清外交体制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趋势。然而，该衙门的设置依照军机处，设大臣、章京两层，大臣无定额，以亲王1人领班，余由皇帝从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简派兼任，衙门的所有官员都同时兼有其他职务，他们是临时抽调来任职的，该衙门事务由各大臣共同主持，遇事由王大臣领衔

总
序

上奏，实行的是常常议而不决的委员制，而非西方国家通行的首长负责制。外交官员也没有改变由政府其他部门官员兼任的总体格局。“在总理衙门存在的40年里，其所表现的种种弊端，诸如分工不明、遇事推卸责任、不谙世界形势、不通外语等，都使总理衙门遭到在华洋人的诟病。”^①

1901年，清政府被八国联军战败，被迫签署的《辛丑条约》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六部之首，并改委员制为首长制，朝着通行的近代外交体制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掌管范围仍包括所有“涉洋”事务。随着清政府实行新政，逐步设置学部、练兵处、商部、税务处、电政大臣等，分管原属外务部管辖的相关事务。1906年，清政府设置外、吏、礼、民政、度支、陆军、法、农工商、学、邮传、理藩等11个部，外务部成为专门的中央外交机关，并位居各部之首。然而，研究者仍然指出：“机构组成的现代化和相对合理性，使外务部与欧洲同行比较起来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如果认为这种在西方列强施压下的改革是完全成功的，那就错了。这里仅举两例，外务部总理庆亲王每年仅去他的外务部办公室一次，因为军机大臣的职务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而他的副手、会办大臣那桐，每周仅在外务部办公一小时。”^②

进入民国时期，中国外交官体制逐步实现了专业化和职业化，形成了一个以外交为终生职志的外交家群体。大量出国留学人员的学成归来，加速了该群体的迅速形成，并成为其主体。据笔者统计，民国时期历任外交部长（含兼任、代理、署理）共36人，有留学背景者32人，占89%；其中留学日本者7人，占19.4%；留学欧美者25人，占69.4%，其中留学美国者就有16人，占留学者50%。就留美学人而言，担任过民国外交总长或部长的归国学人主要来自美国的名牌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其中哥伦比亚大学就有5人之多，他们分别是唐绍仪、顾维

^① 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44页。

^② 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第45页。

钧、陈锦涛、宋子文、胡适。另外，成为民国外交家的“哥大”归国学生还有朱兆莘、陈之迈等^①。李又宁教授在论述中国留学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时指出：“留学生在国外居住一段时间，经历文化的震撼和适应，能够做文化的比较和选择。当他（她）们向国人传播世界知识时，不同于外国传教士，不但语言比较方便，而且具有说服力、诱导力和亲和感。因此，留学生的一项功能，是导引国人逐渐与世界沟通。换言之，留学生是本国与世界的桥梁。”^②担当中国外交家是他们理所当然的历史任务和时代职责。

职业外交家群体在中国外交界的崛起，始于他们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的卓越表现，山东问题辩论、废除“二十一条”交涉、拒签“巴黎和约”，促签“九国公约”，收回山东权益等等，表现出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值得称道的外交技能，身处弱国逆境，却敢于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收回失地的国家权利而奋斗拼搏。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以雄辩的口才、渊博的学识、超人的机智、非凡的技巧，致力国际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上活动，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签署中美、中英新约、筹创联合国等，有声有色，蔚为壮观，在中国和国际外交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二

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比起他们的先辈来，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是在封闭的“大中华帝国”被迫打开国门后，逐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过渡时期应运而生的。中国的外交家曾经历了三个时代。笔者在研究中着

^① 石源华：《论留美归国学人与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② 参见李又宁主编：《华族留美史：150年的学习与成就》导言，纽约天外出版社，1999，第5页。

意于将民国职业外交家与他们的前辈进行比较，以说明和论证民国职业外交家新的历史特征^①。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早在秦汉以前就与周边邻邦及中亚细亚地区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秦汉以后，中国的对外联系远及西方，相传曾横跨太平洋到达美洲。盛唐时代，中外交往进入鼎盛阶段，远近前来通好的国家多达40余国。宋元时代，中外关系再次形成高潮，蒙元帝国横跨欧亚大陆，海陆交通遍及世界各地。明清时代，中国中央王朝依然是“控驭八荒，怀柔万国”“四夷宾服，万方来朝”，郑和七下西洋，交往国家之多，航行规模之大，对外声势之壮，开创了世界航行史上的奇迹。中国古代外交家是中国天子的代表，“天朝上国主义”是他们处理外交问题的总原则，“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他们观察世界地理的基本看法，“天朝居中驭外”是他们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观念，“夷夏大防”“王者无外”是他们处理涉外问题的基本准则。以“朝贡”为主要特征的古代中外关系史，为炫耀封建王朝的权威和盛世，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和发展作出过贡献，但他们除了“朝贡”关系外，几乎不承认其他任何形式的外交关系，已明显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进入晚清时期，帝国主义用大炮和鸦片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然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依然沉浸于“天朝大国”的盲目陶醉之中。晚清外交家与古代外交家一样，基本上由封建官僚兼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面对外国殖民势力的东来和中外交往中出现的新局面，不能适时提出新的外交战略和应对方策，依然是满脑子的封建士大夫的“正朔”观念，视所有的外国人为“蛮夷戎狄”，把外国来访的使节当作“向化来朝”的“贡使”，甚至为了坚持外国使节不得进京、谒见皇帝须行三叩九拜大礼等陈腐的礼仪，与西方国家为此发生严重争执，时间长达150年，不惜牺牲重大外交权益。他们在对外事务中的昏庸无知和在国际舞台上的丑态百出，使他们的名字与近代中国外交丧权辱国的耻辱共存于世。

^① 参见石源华主编：《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总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他们中只有少数人能较快地从中国外交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觉醒，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精华，不同程度地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曾经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外交思想和主张，在近代中国的对外交涉中演出了若干好戏^①。如郭嵩焘出使英伦三岛，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臣；曾纪泽虎口夺食，索回已为崇厚割让给沙俄的新疆伊犁领土；杨儒在对俄交涉中拒签卖国条约，以身殉职；薛福成有智有谋，索还滇缅边境大批国土；黄遵宪尽忠职守，对外交涉成绩卓著，等等。尽管他们在整个晚清的外交家中数量十分有限，但他们毕竟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国近代外交与国际社会的逐步接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们的某些外交思想和主张也为他们的后继者所继承。

民国时期的职业外交家群体是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和民国的诞生而逐步形成的，他们是一个职业外交家的群体，是新时代的产物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他们与他们的先辈相比，面临着不同的国际背景，背负不

^① 蒋廷黻在他的名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初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再版）的自序中高度评价晚清一些政治家的外交才能和功绩，内称：“现在我们一读郭嵩焘、曾纪泽、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薛福成、马建忠诸人的外交文件，我们不能不感觉他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一个曾纪泽，穿上中国的旧式的袍服，略解英文，从伦敦跑到巴黎，从巴黎跑至圣彼得堡，与当代的英、法、俄的外交家周旋，一面不辱使命，一面又得外人敬佩。一个袁世凯，20多岁，随着军队到朝鲜，几年之内，就独当一面。俄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德国人、美国人，凡在朝鲜密谋侵害中国的权利者，袁世凯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打败了。”蒋氏特别赞赏这些人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他说：“李是这时期的中心人物。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有几个能与他比？哪一个创办了像他那样多的事业？直到现在——他死了已经33年——中国最大的海军是他办的；最早的新式煤矿是他开的；最早的铁路是他筑的；最早按的电线是他按的；最早办的纱厂是他办的；招商局是他提倡的。谈到外交，我们只要注意一件事，这35年之内，一切紧要外交问题，没有一个没有他参加意见的。外人与他办交涉有几个不敬佩他？他所最佩服的是哪一个？是日本的伊藤博文，他的知人之明总算不错吧！这个李鸿章自己又是什么人呢？他是个翰林而有军功，论他的出身和教育，他是个纯粹中国旧文化的产物。外国文字他不懂，近代科学他未入门，七十以前他不曾出国门一步。”“曾国藩更加无须讨论。我们只要看他办的天津教案的精神就够了。他不顾一切时人的评议和外人的威胁，抱定宗旨，为国家，为正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曾文正不但是中国旧文化教育的产物，他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结晶。”

同的民族使命，具备不同的知识结构，也有着不同的历史贡献，因而他们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多彩的个性形象的群体。

首先，民国外交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既不同于古代“万邦来朝”式的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大一统格局，也不同于晚清列强环伺、鲸吞中国的东亚殖民格局。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迫使列强各国在中国的势力由进攻转为防守，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外国驻华公使团已不再风光，中国的国际地位由谷底开始缓慢回升的历史新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得列强在华势力大受挫折，中国得以在巴黎、华盛顿会议上两次要求与列强全面修订不平等条约，虽未如愿，收获甚微，但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继而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成员，使得中国百年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愿望成为现实，中国得以跻身世界“四强”行列，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之一，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为民国外交家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和施展才能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他们努力的结果。《顾维钧回忆录》生动记载了国际大背景的变化对于民国外交家的影响。如年仅30岁的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脱颖而出、一举成名，就与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局势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已呈上升趋势的大背景密切相关。民国时期职业外交家的举动虽然没有封建盛世时代的外交家那样高屋建瓴、纵横万里的气势，却比晚清时代的外交家处处挨打、江河日下的处境好多了。

其次，民国外交家所负的民族使命也与他们的前辈大不相同。中国古代外交家的使命是代表天子炫耀封建王朝的显赫威势和强盛国力，颂扬“天朝上国”的恩惠天下和德政声名，维护大一统帝国的统一和强盛。晚清外交家的使命则是在中国国际地位急速下降的情况下，消极地抵御列强各种形式的侵略，力图挽救和维护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统治和力争避免中国国土的进一步沦丧。清王朝的垮台和民国的建立，使民国外交家的服务对象和民族使命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不再为封建帝王尽忠效力，虽然他们

中也不乏甘作军阀首领之走卒者，但就总体而言，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利益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他们面对外敌入侵、军阀混战的内外交困局面，提出了不少富于创见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思想、战略和主张在表明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值得称道的外交艺术，他们为争取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收回晚清丧失的国家权利、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做了多方面的努力，改变了“弱国无外交”的旧规，谱写了民国外交史有声有色的新篇章。

再次，民国外交家群体的构成和知识结构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一般说来，晚清的外交家如同古代的外交家一样，来自所谓的“封疆大吏”，其任职的机关虽已由清朝的礼部和理藩院改为稍有近代气息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外务部，但他们接受的教育则完全是正统的封建儒家学说，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专门的国际关系理论和近代外交技能训练，一般也不懂外语，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对外交涉的需求。进入民国后，中国外交体制逐步实现了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北京政府的首任外交总长陆征祥，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对中国外交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规定只有经过外交专业训练的人，才能担任外交部的重要官员和驻外使领馆人员，这项改革在整个民国时期得到了坚持，民国外交家的总体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形成了一支职业外交家的队伍。他们中不少人的家庭出身，如陆征祥、伍廷芳、颜惠庆、王宠惠、顾维钧、王正廷、宋子文等，都有基督教的背景，有的直接是基督教徒的后代，他们的父辈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群体。这种背景使他们得以有机会和条件通过各种形式出国留学，在国外接受专门教育。他们一般通晓国际政治和近代外交知识，不少人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于中国外交问题有专门的理论研究。民国外交家的留学经历、高学位以及学者兼外交家的身份，使他们易于为国际外交界所接受和尊重，便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以他们的博学、聪慧、才智以及与国际外交界的广泛联系，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努力。朱葆缙教授称他们为“英美系”外交家，并概括了6个特征：1. 出生于中国东南沿海，且为发达的商人之子；2. 在早期受教育的过程中，曾受过几年传统

教育；3. 曾经在中国的基督教会学校就学过；4. 在美国接受进一步的教育；5. 起初担任英美专家、秘书或教师的工作；6. 先后在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服务过等^①。民国外交家的知识结构已大不同于他们的前辈，能较好适应时代的需要，开展有声有色的新时代新外交。

又次，民国外交家的历史地位与社会贡献也与他们的前辈大不相同。中国古代的外交是封建王朝政治的附属物，一般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不会产生直接的重要影响，外交家的地位不高，作用也十分有限。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之一，并且起着主导作用，外交成为决定和主宰中国社会发展的因素，外交家在中国政坛上的地位大大提升。然而，由于晚清外交家处在中国国际地位急速下降的过程中，他们的名字往往与丧权失地的耻辱相联系，民国外交家则处在中国国际地位缓慢攀升的过程中，他们的外交活动与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努力相联系。如前所述，民国职业外交家在中国外交界的崛起，始于他们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的卓越表现，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等“国际派”外交家蔚然成名，成为国际舞台上著名的外交活动家。随后，他们在实施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广州、武汉政府的“革命外交”，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外交”，抗日战争时期“南联英美，北结苏俄”的“抗日外交”和跻身“四强”的“大国外交”等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尽管从总体上说，民国职业外交家由于受到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外交实绩并不能令后人感到满意，但他们为改变中国的贫弱地位而坚持不

^① 转引自应俊豪：《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1，第76页。

懈的奋斗精神已使他们声名大震。陆征祥、伍廷芳、颜惠庆、王宠惠、王正廷、顾维钧、陈友仁、宋子文以及后期的叶公超等的外交生涯，表明他们不仅在国内深受时人的尊敬和推崇，而且都有着很高的国际知名度。他们在中国外交界历任要职，不少人都是三代或四代元老，不仅当过重要国家的公使和大使，而且多次担任外交部总长或部长，如陆征祥、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王宠惠等曾多次担任外交总长或部长，王宠惠、徐谟、顾维钧等还担任过国联行政院主席、国际法庭的法官和大法官，在中国的对外事务中和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同程度地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不仅如此，在军阀混战、派系纷争的中国特殊政局下，北京政府时期的内阁如走马灯似的变换，由于外交家们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威望，一般都从海外留学归来，与国内的各种政治派别无特别密切的关系，保持着某种超然的态度，使得他们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也发挥了超出常规的平衡作用。当各派政治势力或军事集团势均力敌难以平衡之时，他们便成为各派势力共同能够接受的过渡性人物。陆征祥、伍廷芳、颜惠庆、王宠惠、王正廷、顾维钧等都一次或数次担任过代理国务总理、国务总理，甚至有的摄行总统职权，短时间地执掌国家最高权力。这种由外交家代行国家元首或行政首脑的实例，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政治发展史上也是少有的现象，然而，在北京政府时期却极为常见。

进入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国民党独裁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外交决策权集中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或中央政治会议，抗日战争时期更集于国防最高委员会，后期甚至落入蒋介石一人之手，所有重要的外交指令均出于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外交部成为一个单纯的执行机关。外交家更多的须听命于党国，其个人施展才能的余地有所缩小，由政治家兼任外交家的情况也逐步增多，如国民党两巨头蒋介石、汪精卫都曾长期或短期兼任过外交部长，军事将领杨杰、商震、蒋耀祖、蒋作宾等出任大使、特使等重要外交职务，国民政府的“钱包”宋子文则长期涉足外交事务，被称为“英美派”的首领，抗日战争时期出任外交部长，时间近4年之久，并数度以特使身份担任重要外交使命，成为外交家群体中重要的一员。

然而，职业外交家群体仍在国民政府的对外事务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顾维钧因在北京政府历任要职，尤其是由于担任张作霖安国军政府外交总长，曾遭南京新政府的通缉，但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又被国民政府重新起用，再任外交部长，以后成为中国外交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北京政府一批外交元老如颜惠庆、施肇基等都重返外交舞台，继续为国效力。而原属国民党系统的职业外交家如王正廷、王宠惠、伍朝枢、郭泰祺等人更是受到重用。另有一批大学教授、著名文人也径直加入外交家的行列，著名者有王世杰、胡适、蒋廷黻、叶公超等，有的成为终生服务于外交事业的职业外交家，他们都在不同时期的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民国外交部长人选中，陈友仁是一位具有特殊身份的外交家。他出生在海外，是长期侨居拉丁美洲特立尼达的英籍华裔律师兼实业家。辛亥革命后自动归国服务，以律师兼新闻记者的身份，投身国民革命的洪流，成为名震四海的“革命外交家”。他的经历虽与一般职业外交家不同，却数度出任外交部长，包括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广州、福建反蒋政府的外交部长，终生致力于中国的反帝事业，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占有特殊的一席，也是民国职业外交家中唯一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建有纪念碑的人物。

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和帝国主义共同统治中国的基本格局没有得到改变，民国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虽已处于缓慢的攀升过程中，但外交总态势仍然处于被动，也由于外交家们个人的某些原因，如他们中有些人曾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过军阀混战的行列，在对外事务中成为军阀的附庸，也有些人由于长期生活在国外，与列强国家的上层人士关系密切，也会在外交活动中受到他们的影响，被国人批评为“亲日派”“英美派”或“亲俄派”等等。有鉴于此，外交家们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和经办的外交事务并非尽如人意，有的是不合时宜的，有的留下了失败的记录，有的甚至仍然是丧权辱国的，因而受到时人和后人的强烈批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于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评价是有欠公正的。这与国共两党斗争，新旧政权更替有关。较为典型例子的是，顾维钧由于参加内战后期国民政府向美国的求援外交活动，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持敌对立场，而被中国共产党公布为“内战战犯”，遭到全国通缉，一度成为革命的对象，自然也就不可能对其一生的外交生涯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了。其他的民国外交家，除陈友仁被称誉为“革命外交家”等特殊现象外，一般也因与旧政权有关系，著名者如伍廷芳、陆征祥、王宠惠、颜惠庆、王正廷、施肇基、郭泰祺、宋子文、王世杰、叶公超等外交家，都被关入学术界的“冷宫”，而一般从事外交活动的职业外交家群体，更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人对他们的外交活动进行研究，甚至遭到尖锐的批判，导致他们的后人也受到不公正待遇。

同时，这种状况也与中国大陆学术界在民国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的缺陷有关。由于列强长期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以及中国实行反帝政策的现实需要，也由于百年来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族感情的制约，以及在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影响，在民国外交史的研究中存在着若干倾向性问题：一是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取代丰富多彩的中华民国外交史的研究。二是以“弱国无外交”的简单结论笼统批判和全盘否定历代统治者的外交活动为“屈辱外交”。三是认为晚清以来的中国国际地位一路跌落，完全忽略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国际地位不断有所提升的历史事实。由此也殃及对民国时期外交家的评价，存在着贬多于褒，甚至有贬无褒的状况。在各种各样的书籍、报刊以及历史读物中，他们往往被贬称为民族妥协投降主义的代表人物，被斥骂为“投降派”“卖国贼”“亲日派”“英美派”等等。如“文化大革命”前较有代表意义的外交史著

作《中国外交史》在评价巴黎和会时^①，就将北京政府代表团团长陆征祥指责为“著名的亲日派”，把代表团成员顾维钧、王正廷指责为“亲美派”，批评“顾维钧与威尔逊的亲近顾问密勒取得秘密谅解，双方事先非正式地商讨一切问题，王正廷后亦参与其中”，“执行亲美的外交方针”，批判“对于帝国主义巴黎和会的这种无理决定，中国反动统治阶级从北京政府到它的代表团都甘愿接受，主张签订凡尔赛条约，并且举出卖国的理由，谓不签字有害六端”等等，强调只是由于“国内人民自山东问题决定的消息传来后，群情愤激，旋即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留日学生及海外华侨亦纷纷响应”，才迫使“北京政府代表团因此不敢签字，并引咎辞职”等。无视历史事实，对于顾维钧、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等外交家在巴黎和会上的积极活动完全持否定的态度，视而不见他们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自主，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所作的种种努力，对他们进行不恰当的批评和指责。

对民国职业外交家评价发生历史性变化，既得益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大陆历史学研究的大环境发生变化，更与20世纪80年代初《顾维钧回忆录》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出版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顾维钧回忆录》是中国职业外交家顾维钧的长篇回忆录，

^① 《中国外交史》下（1917~1949），外交学院1958年内部刊印，第9~17页。

也是民初以来 50 年间中国对外交涉的历史实录^①。随着这套译书的出版，中国学术界对于外交史的研究同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顾维钧回忆录》不仅成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外交史著作的重要资料依据，而且推动了对民国外交史上一系列问题的重新评价和论证。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学者对于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兴趣，最初就来自于《顾维钧回忆录》所揭示的种种鲜为人知的丰富的外交史料。

对于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评价随之产生了重大的变化。1986 年邓野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②，首先对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杰出表现作了高度评价，颠覆了中国传统观点对于巴黎和会的提法，对推动学术界重新评价民国外交家群体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1989 年，笔者和钱玉莉共同发表《杰出的外交家顾维钧》，全方位地评述这位著名的外交家不平凡的一生，指出他在半个世纪中积累的外交经验是“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③，对于民国外交家评价的变化

① 《顾维钧回忆录》自 1960 年起，历时 17 年才得以完成，英文打字稿 11 000 页。为完成这部回忆录，先后有 4 位博士、5 位打字员和 2 位助手参与其事，一共花费 25 万美元。如此规模的回忆录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其学术价值为人所共知，然而出版问题却历尽周折。美国纽约海洋出版社曾计划将原本缩印成书，分装 20 册，每年出版 4 册，5 年出齐，已订出版草约，终因考虑销路而未能实现。稍后，顾维钧考虑到出版既有困难，自己年事又高，乃要求哥伦比亚大学请《纽约时报》所属美国缩微公司将回忆录制成缩微胶卷。1977 年，台湾《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致函顾维钧，计划将回忆录逐段翻译，逐期发表，然后分册出版。后亦因经费、翻译人员等问题而无法实现。顾维钧在回忆录的附言中不无感慨地说：“由于我毕生致力于中国的对外关系，如果我的回忆录能被译成中文，我将不胜欣慰和感激。这项翻译工作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我希望这对研究那些动乱年代的外交史的中国学人是有所补益的。”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中国驻联合国外交官陈直鲁的努力下，购回回忆录的缩微胶卷。随后经顾维钧的大女儿顾菊珍和顾氏本人同意，近代史所决定将回忆录全部翻译出版。1983 年 5 月，《顾维钧回忆录》第 1 册由中华书局出版。1985 年 2 月第 2、3 册出版，1994 年 6 月最后一册（第 13 册）出版，历时 11 年，全书译文连同索引约计 600 万字。这是一个宏大的翻译工程，其学术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② 邓野：《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6 年第 2 期。

③ 石源华、钱玉莉：《杰出的外交家顾维钧》，《上海研究论丛》第 2 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